

荆沙旧影

白云桥的历史沿革

黎国亮



上世纪二、三十年代的白云桥,由荆沙河南岸向北拍摄。

白云桥位于荆沙河上,明清时期为水陆要冲,是荆沙两城重要的交通节点。关于其历史沿革,清光绪时杨吉作有《重修白云桥记》叙述颇详细,现录于下:

白云桥在府东南四里许,左通沙镇,右接郢城,舟车之所辐辏,商贾之所往来,终日攘攘,莫不于是乎问津,诚冲衢也。明嘉靖间,葛公创建石桥,以济行人,后经兵燹,日就倾圮,盈盈一水,遂病于涉。余祖黄公心窃悯之,爰于康熙四十八年捐资重建。百余年来,成赖其利济焉。惟地势稍平,桥洞微低,每当涨水时,舟楫辄阻。且两旁未设扶栏,行者或值深夜,不无顾虑之虞。余恒欲更张其制,并补所未备。而工费浩繁,独力难举,有怀莫伸者,盖亦有年。癸未春,商之邑人熊公,公慨然许诺,倾囊相助,并佐子经理其事。于是鸠匠匠材,经始于甲申二月,凡八阅月而告竣。桥洞增高四尺而宽,左右添设石栏十二丈余。今而后击楫者自在而行,庶不忧于挂碍,举趾者从容而进,无所用其顾虑。功虽艰而利实溥矣。余以衰朽之年,何能兴兹盛举?赖熊公好善不倦,殚瘁弗辞,厥功甚伟;更承高义诸君,捐资乐施,玉成其事。是不可不传诸久远也。故特志其梗概云。(《光绪荆州驻防八旗志 卷16》)



上世纪二、三十年代的白云桥,由荆沙河西向河东拍摄。



白云桥现状,2022年4月拍摄。

根据碑文可知,该桥在明嘉靖年间由“葛公”改建为石桥,清康熙四十八年杨吉的先祖“黄公”再次重建,但该桥始终存在诸多缺陷,往往造成不便。首先是地势低洼桥洞较矮,每当涨水时舟楫无法通行;其次是桥上未安装栏杆,有比较大的安全隐患。于是在光绪九年(1883年)由本地商人“熊公”出资进行改建,光绪十年(1884年)二月兴工,历时八个月完工。新建的白云桥,桥券升高四尺,桥上添设石栏十二丈。整个石桥为单券石拱桥,虽属该桥完工已过去三十余年但桥梁的整体状态还算不错。我们可以看到桥面一侧设有20根立柱与19幅栏板,栏板上雕刻有荆沙地区流行的如意云纹,这套栏板当是上文所述光绪十年添加者。孔券中间设有戏水兽,孔券两侧下方有较大的石构燕翅驳岸。桥的南岸设有石牌坊一座,推测该牌坊是《重修白云桥记》。整个桥梁造型美观大方,特别是拱券的弧度展现了东方桥梁迷人的魅力,以至于西洋摄影师不厌其烦的对该桥各个角度进行了取景拍摄。

出,会邻火延烧,廷贵犯烈焰入室教母,并媾焉。事闻,官紳士民为之表墓而挂匾。(《沙市志略卷七》)

明孝子张廷贵墓在白云桥北,事详前孝子巷。(《沙市志略卷十》)

由上可知,张廷贵明隆庆年间居住在沙市孝子巷(旧名不详),早年丧父,以厨师为业,对待母亲十分孝顺。一次由于邻居失火,延烧到他家,他奋不顾身犯焰救母不幸双双遇难。政府为了表彰他的孝道,为其立碑明旌,大家为了纪念他的事迹将其居住的巷子改名为孝子巷,王百川发现此碑后将其录于志中。但这个说法最早的来源应该是《乾隆江陵县志》:

白云桥,在刘公祠左,明嘉靖中建,国朝康熙四十年重修。泓然一渠直绕郢间,东南有张孝子墓,俯仰白云思亲意耶?旁有白云阁,焚浆以饮行者,夏秋间纳凉于此,梓迎乱碧,塔登孤青令人有凄凄况也。(《江陵县志》)

我们注意到,乾隆江陵县志的编撰者对白云桥的名字只是提出一个猜想,并不是一种有根据的说法。细推过来白云望亲的典故用在这里并不十分准确,虽然都是记录孝行,但白云望亲的着眼点是在异乡的游子对父母家乡的思念,张廷贵显然并非客居,身后也与母亲同葬一地,使用此典故恐不恰当。

关于白云桥名字的来历,沙市志略上有如下记载:

白云桥,明嘉靖中建,原名龙坡桥,康熙四十年重修,更名今名,以毗近张孝子墓,取白云望亲之意。(《沙市志略卷五》)

王百川先生认为白云桥的名字是因为桥附近有孝子张廷贵的墓,有白云望亲的意思,这个说法流传颇广,多书引用,但实际上恐系讹传。白云望亲这个典故取自《新唐书·狄仁杰传》,说的是唐代名臣狄仁杰年轻时在山西并州做官,有一次他登上太行山,由于思念父母便朝河南的方向眺望,望见家乡方向上空飘着一朵孤单的云彩,他指着云彩对属下说我的父母就住在那朵云下方。他站在那里怅望许久,直到云彩飘远后才离开,以后常以此典故比喻远在异乡思念父母故乡。

《沙市志略》对张廷贵事迹有多处记载,现录于下:

孝子巷,在上街。明孝子张廷贵旧居,有传,详人物。廷贵犯烈焰教母,俱及于难,邻里呈状于官,邑令刘以明旌其宅里,郡守王元敬表其墓门,乡宦曹仲撰碑记事实。惜后来修志者失采,今仅于模糊中辨之,事在隆庆庚午年。(《沙市志略卷四》)

张廷贵,素业庖丁,父早丧,养母以孝闻。母疾,曾割股疗之,得愈。一日廷贵外出,会邻火延烧,廷贵犯烈焰入室教母,并媾焉。事闻,官紳士民为之表墓而挂匾。(《沙市志略卷七》)

明孝子张廷贵墓在白云桥北,事详前孝子巷。(《沙市志略卷十》)

由上可知,张廷贵明隆庆年间居住在沙市孝子巷(旧名不详),早年丧父,以厨师为业,对待母亲十分孝顺。一次由于邻居失火,延烧到他家,他奋不顾身犯焰救母不幸双双遇难。政府为了表彰他的孝道,为其立碑明旌,大家为了纪念他的事迹将其居住的巷子改名为孝子巷,王百川发现此碑后将其录于志中。但这个说法最早的来源应该是《乾隆江陵县志》:

白云桥,在刘公祠左,明嘉靖中建,国朝康熙四十年重修。泓然一渠直绕郢间,东南有张孝子墓,俯仰白云思亲意耶?旁有白云阁,焚浆以饮行者,夏秋间纳凉于此,梓迎乱碧,塔登孤青令人有凄凄况也。(《江陵县志》)

我们注意到,乾隆江陵县志的编撰者对白云桥的名字只是提出一个猜想,并不是一种有根据的说法。细推过来白云望亲的典故用在这里并不十分准确,虽然都是记录孝行,但白云望亲的着眼点是在异乡的游子对父母家乡的思念,张廷贵显然并非客居,身后也与母亲同葬一地,使用此典故恐不恰当。

又据汪道昆《太函集》记载“荆州西度河

出沙市,故老方铎、方铎为桥曰白云桥,旁筑一庵曰白云庵……”此记载与嘉靖荆州府志完全吻合,由此可知此方氏即可能是前文修桥记中提到的葛公,白云桥木改石后,桥上可能建有廊,与清代的桥形制略有差异。在方氏修桥几十年后,方氏族人方景真再次组织维修了白云桥,关于方景真还流传着一则他与白云桥的故事。方景真出生于安徽一个世代为商的家庭,本来他的家族希望他能走上科举的道路,但在他十五岁的时候由于父亲生病不能持家,他被迫弃儒从商。命运的改变,反而展现出了他杰出的商业才能,早年间便在山东的棉花贸易中展露了头角。他为人仗义,总是不求回报的帮助别人,有侠者之风,所以明代汪道昆在其《太函集》中为他专门列有“儒侠传”。万历时期他准备从荆沙前往四川做茶业贸易,看到荆沙河上自家“大父”兴建的白云桥损坏十分严重,于是独自出钱将其修缮一新。碰巧此时本郡的张知府正好奉命疏浚河道,看到白云桥修缮的不错,于是便把修桥时刻在桥上的方氏名字抹去,把功德记在了自己的名下。这位张知府离任后,群众们打抱不平,要求官府恢复方景真的姓名,景真知道以后笑着说道“利在桥,不在名,且桥在名亡,则亦未尝不利,桥亡则利俱亡矣,焉用名?”,众人听后,无不佩服方景真过人的见识,赞到“此长者之言也”。

明代方氏修桥的事件,揭示出明代徽商把荆沙地区作为入川的前哨站,大量的人员物资在这里聚集,是明清川楚商道的一个缩影。据《光绪荆州府志》记载,白云桥前曾有安徽会馆,可见白云桥一带从明至清末一直为徽商的一个据点,经营达数百年之久。

上世纪二、三十年代,白云桥成为荆沙两城人力车地盘分界点。人力车源自日本,所以又叫东洋车、黄包车。清朝灭亡后,荆沙地区大量失去经济来源的满族八旗子弟进入这个行业。1912年沙市同时成立履泰、均益两家人力车公司,后合并为“履泰益人力车出租公司”(简称车行),有车356辆,到1927年发展到700多辆。1924年江陵大同车业公司成立,有车200辆。此后,江陵、沙市人力车以白云桥为界,凡乘车往返江陵、沙市者,均需在此换车前往,双方不能越雷池一步。1929年,江陵、沙市绅士出面,邀请专员及两车业公司老板磋商,才打通了白云桥界限,至此,江陵、沙市人力车得以相互通行。日军占领荆沙后,人力车逐渐衰败,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开始逐步取缔人力车,到解放初五十年代逐渐淘汰。人力车白天一般停在江边码头等候轮船,比较集中的场站有拖船埠、刘家场,五一路口、金龙寺附近及白云桥等地。人力车可谓是新中国成立之前荆沙地区的一个标志性的景观事物,一些老照片为我们留下了荆沙民国时期人力车的影像,人力车夫大都戴着大檐帽,赤膊上身,穿着草鞋,洋车设有敞篷竹帘,在公共交通尚不发达的时代,无疑为民众的出行提供了新的选项。

1940年,荆沙陷落后夕,国民党军三十二师师长王修身于6月4日在沙市公共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,申明要会与荆沙共存亡,要求各界人士等各安生业勿得自相惊扰,影响治安。到了第二天(6月5日)他命人将白云桥炸毁,表示他背水一战的决心。但背地里三十二师的主力早已撤出荆沙,这些行为不过是为了虚张声势,稳定民心罢了。可惜的是这座拥有几百年历史的古桥就这样被“牺牲”破坏掉了,战后桥面经过修复后尚可简单通行,据沙市地名志记载,残存的古桥拱券孔径4米,桥长20米,宽5米,桥的拱券西侧一面已经大部分坍塌。国军炸毁该桥后,日伪时期在白云桥的东侧几百米的位置新建了一座“新桥”是以为襄沙公路桥,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军焚毁,1950年重建,为石墩木板桥。1968年改建汉沙公路时又在“新桥”东南600米处新建钢筋混凝土板桥,亦名“新桥”,原新桥改为“木新桥”。1984年“新桥”改建为桁架拱桥,建成后更名为白云路桥。

既然新白云桥已经矗立于荆沙河上,旧桥自然就成了“古白云桥”,1986年沙市市人民政府决定重建古白云桥,限于当时的文物保护的认识,旧桥遗存并未得到很好的保护,原有形制亦未得到有效尊重。建成后的白云桥改为三孔石桥,整个造型较清桥略为逊色,但不失为一处有益的风景区。桥北岸,复设有“古白云桥”龟驮石碑一座,阴面为《重建白云桥碑记》。2016年7月,大风将石碑砸碎吹落,龟头被砸坏,现已修复。

▲上世纪二、三十年代的白云桥 由荆沙河北岸向东南岸拍摄。

翰墨荆楚②

读楚笔记

打回老家去!楚人问鼎中原的动力与情怀

张卫平

放眼春秋战国时期的“国际社会”,楚国无论怎样的强大,哪怕强大到可以称霸一时,横行天下,但说到底仍然只是一个缺少“主权”的诸侯国。作为周天子的臣民,楚庄王哪来的“问鼎中原”的勇气呢?

其实,楚人对周天子的不敬和冒犯,源于周朝对楚人极端的不公。本来,当年楚人在武王伐纣中随同武王的队伍与商朝拼死一搏,为周武王的改朝换代当皇帝做出了突出的贡献。然而,楚人在战争中做出的巨大牺牲,甚至为此献出了自己头领鬻熊的生命,可是楚人满心的期待却化成了泡影——周武王在论功行赏、分封诸侯时竟然唯独漏掉了立下天大功绩的楚人。直到周成王时期,熊绎才被封了一个子爵。尽管楚人终于获得了一个正式的爵位,但楚国君主在天下所有的诸侯中,几乎是地位最低下的那一个。

按理说,楚人属于根正苗红、出生中原、正儿八经的炎黄子孙!对此,诗人、政治家、楚国左徒屈原在《离骚》中追溯楚人起源时曾经骄傲地说:“帝高阳之苗裔兮,朕皇考曰伯庸。”屈原说的就是自己是古帝高阳氏的子孙。只不过,此一时彼一时,有着皇家高贵血统的楚人在殷人的攻击下被迫不断向南迁徙,常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。可以说,是苦不堪言。商朝晚期,鬻熊为了振兴楚族,毅然决然地带领楚人参加了周武王伐纣之战的“联合国军”,浴血奋战,冲锋在前。仗是打胜了,然而令楚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武王坐上天子宝座后把王族、功臣都分封到各地去做诸侯,唯独“偏偏漏掉了楚人”。

其实,受歧视的楚人并非只是被周朝看不起,早在商朝时就被赶出了中原,“商王朝的部队更是像驱赶动物一样随意猎杀他们”,因为,“对于商王朝来说,楚人是落后的蛮夷,不配与中原人分享世间的任何资源”。正因为如此,楚人才会冒着被灭族的危险去帮助周文王,在“决定中原命运的大战中”付出了血的代价。但是,楚人的巨大牺牲与付出并没有得到期待中的回报。于是,一颗仇恨的种子也许就在这一刻深深地埋了下来。

虽然,楚人“筚路蓝缕”,逐渐在南方站住了脚跟。但是,楚人非常清楚,这样弱小的经济实力要想重返中原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正如王伟先生在《楚国简史》中所写的,楚人举全族之力殊死一搏,为周王朝的建立流血牺牲,立下了赫赫的战功,但是“楚人付出了一切”,他们流干了血,也失去了尊敬的头衔。但所有的付出,竟没能换来一丝回报。“他们觉得自己倾尽了所有,可是对于周朝而言,这只是一个偏远的蛮夷之族尽了一点微薄之力而已”。投入与产出极端的不平衡,让楚人从上到下极度的不爽。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!无论是在商王朝,还是在取而代之的周朝,楚人都是受歧视的二等公民,都难入天子的法眼。

周朝取代殷商以后,周天子举行诸侯盟会,通知楚国的君主来中原参会。熊绎以为楚的出头之日终于到来了,便兴高采烈地驾着柴车,满载着楚国特有的“苞茅”,立即赶回中原老家,去拜见了周天子,献上了千里迢迢带来的贡品。然而,令楚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周天子正式召开诸侯盟会时,熊绎居然连进殿参会甚至列席会议的资格都没有,只能如同他们的先祖一样,与鲜卑之君一起在宫城外看守祭祀用的火种。说得好听一点,此时楚国君主主持了周王朝的火事,是一个小小的京官——“火政”;说难听一点,最多也就是一个有点“级别”的“会务组”工作人员,就如同玉皇大帝在天上封给孙悟空的那个“弼马温”。

特别惨的是,熊绎甚至连会议结束后的酒宴也没有资格列席。直到此时,熊绎才知道,他这个君王在周天子和中原地区诸侯们的眼中,就是一个身份卑微的下人,活脱脱一个“店小二”!当时,熊绎在门外听着宫城里诸侯们欢笑着干杯时,心如刀绞。周天子的漠然,中原诸侯国的歧视,让仇恨的种籽在楚人心底开始发芽、疯长,为若干年后楚庄王的问鼎中原埋下了伏笔。高贵的身份没有争来,无奈的楚人只能在蛮荒之地奋力拼搏,与天斗,与地斗,与一切敌人斗争着。一代又一代,楚人就这样在广袤的云梦古泽里披荆斩棘、繁衍生息,后来楚文王迁都荆州纪南城,这才得以称霸一时。虽然,沧桑的岁月一点点磨去了他们身上的中原气息,但是他们仍然“强烈地感受到,那些部落的文化与先进的中原文化不能相提并论。”这种文化优势刺激着他们更怀念中原,因为他们不想被人称为蛮夷”。一连串不公平的待遇强烈地刺激着楚王,让楚王深切地意识到,“与其坐以待毙等待别人来重视,不如让自己迅速强大起来!”正如史学家王伟先生所说的,“这件事对熊绎来说,无疑是一次沉重打击”,也“给楚人敲响了警钟”!熊绎开始实行韬晦政策蒙蔽周天子,在悄然扩张的同时按时向周朝纳贡,每逢周王朝有朝会时还是任劳任怨地去主持火事。

的确,天上不会掉馅饼!知耻而后勇的楚人,一方面继续维系着与周朝的关系;另一方面,低调地“闷声发大财”,不断地吞并周边的小国,奋力扩张着自己的地盘。经过几代人的开疆拓土,楚国将五十来个小小国家纳入自己的版图。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,楚王在“国际社会”上开始有了话语权。但是,那些中原的诸侯国仍然没有用正眼去瞧一下楚国。楚国上下,对于这种被中原人漠视和另眼看待的境遇非常不满,于是心底深处那些“不服周”的火苗便开始向外燃烧着。最后,竟然燃成了冲天大火。

俗话说,名不正则言不顺,言不顺则事不成。身处蛮夷之地楚人不甘做一个“乡下诸侯”,他们一直想要结束这种屈辱的局面,就连梦里想的都是“打回老家去”!

打回老家去!这就是“不服周”的楚人问鼎中原的强大精神动力!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,楚王熊渠才会梗着脖子、昂首向天大喊:“我本蛮夷,不与中国之号谥!”



江山多情(陈国作)